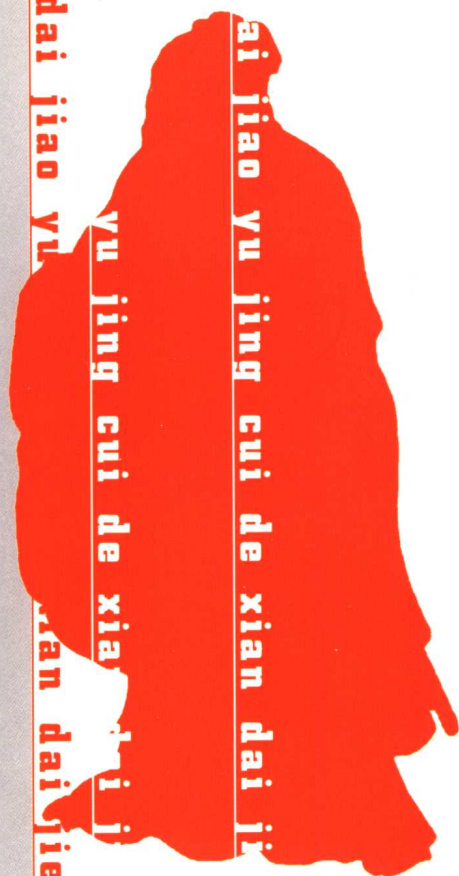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中国古代教育精粹的 现代解读

◎张书丰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zhong guo gu dai jiao yu jing cui de xian dai jie 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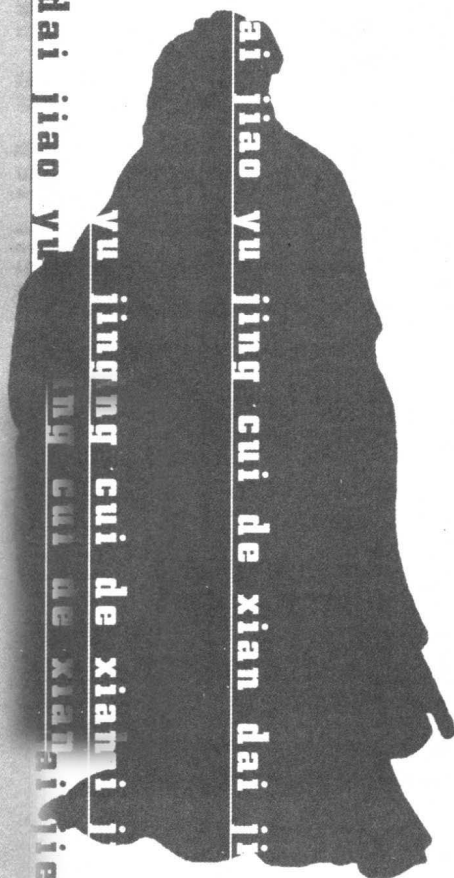
zhong guo gu dai jiao yu jing cui de xian dai jie du

zhong guo gu dai jiao yu jing cui de xian dai jie du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中国古代教育精粹的 现代解读

◎张书丰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zhong guo gu dai jiao yu jing cui de xian dai jie d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教育精粹的现代解读 / 张书丰编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5

ISBN 7-209-03699-7

I. 中... II. 张... III. 教育—研究—中国—古代
IV. G5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804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新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40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论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理论的继承与弘扬

(代前言)

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度，即使从周公“制礼作乐”，创辟雍、小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乡的时候算起，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已经有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如果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绵延发展的历史，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拥有仁爱、勤劳、智慧、勇敢的民众，拥有特立精神与创造能力的民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对中国传统教育刮目相看，因为创造了这一切的是延续了三千余年的传统教育。

—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获得教育的最佳效果，我们的先哲、先贤对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都进行过深入思考，有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理论体系是在先秦时期完成的。这一理论体系，以对人性问题和知、行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为基础，包括“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论、“藏息相辅”的课程论、“自学辅导”的方法论。

孟子在论述夏、商、周的学校教育时指出：“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这一论述符合我国古代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特征。“明人伦”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论。

《学记》在论述古代大学的教学过程时指出：“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又说：“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正业”是正课的教学活动，学生要通过正课的学习有所长进；“居学”是课外的学习活动，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从从容容地增长知识。“藏息相辅”是我国传统教育的课程论。

孟子说：“梓匠轮輿，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又

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与人规矩”是教人以原则与方法。教师的教学就是把原则与方法（或者说是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教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而加深学习的方法必须靠学生通过自我钻研的途径去获得。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学生的自我学习，他们把教师的教学活动比作“叩则鸣”的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处于辅导的位置上。“自学辅导”是我国传统教育教学的方法论。

自汉至清，中国的官、私学教育始终在发展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教育教学问题的思考也在逐步加深。人们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对知、行关系的理解，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但是，从总体上看，大的理论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传统教育教学理论是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中不乏中国先哲、先贤的教育智慧。

古人把“立志”放在教育的首位。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把志向比作人的灵魂，认为人不能没有灵魂。他重视对弟子的志向教育，并善于用巧妙的方式引导弟子树立正确的志向。

墨子认为，人志向的正确与否、远大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们智慧的发挥。他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要求弟子立“强志”，以便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孟子发展了孔子有关志向教育的思想，提出了“持志养气”的修身方法。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他所说的“气”是一种精神力量，称这种精神力量是最伟大、最刚强的，如果得到培养就可以充斥于天地之间。

荀子有句关于志向的名言，足可以成为青年人的座右铭。他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冥冥之志”，是一种深沉的志向；“惛惛之事”，是默默地、孜孜不倦的努力。

宋明理学家也重视志向教育。朱熹认为志向是人的奋斗目标，没有了志向，人也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说：“书不记，熟读能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朱子大全·沧州精舍又喻学者》）张载明确提出：“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张子全书·学大原》）明代的王守仁则做了一篇讨论立志问题的专文，他说：“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他强调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

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王文成公全书·示弟立志说》）

古人把志向比作人的灵魂，比作人的生命，把志向教育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是把握住了教育的核心。

古人重视环境的教育作用。人所生长的环境是重要的教育因素，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都进行过颇有价值的论述。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孔子之所以主张选择仁者为邻里，正是看到了环境的教育价值。

墨子对环境的教育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以“染丝”比喻环境对人的影响，既生动又贴切。从这一认识出发，墨子主张积极施教，以使人受到良好环境的熏陶。

孟子把环境的教育价值扩而大之，运用于对国家的治理，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意思是说，在丰收年景与灾荒年景，子弟的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原因在于社会影响的不同。由此，孟子认为创建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对于青年人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仁政”主张，要求统治者“善教”“爱民”。

对于环境的教育作用，荀子作过精彩论述，他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为喻，提出了“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的主张。（《荀子·劝学》）

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通过日积月累的熏陶方式实现的，其影响往往根深蒂固，因此，古人重视环境的教育价值是把握住了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人重视道德实践。中国有以德治国的传统。相传古帝尧曾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即发挥自身高尚道德的力量，以使族亲和睦，百姓善良，天下平和。孔子于“礼崩乐坏”之际，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主张。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方法，以“文质彬彬”的君子为培养目标。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孔子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当弟子向他请教怎样成为仁人，怎样成为君子的时候，孔子从不做概念推理式的解释，而是指导弟子在社会实践中去体会“仁人”和“君子”的蕴涵。

墨子把“合其志功”作为对人进行道德评判的标准，认为在对一个人的

道德作出评判时，既要考察他当下的行为表现、考察他要实现的目标，更要考察他行为的效果。

在论述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荀子提出了“德操”的概念。所谓“德操”，就是道德有操守。荀子认为人的道德操守必须经过理论学习、深入思考、长期实践和不断消除有害道德的因素才能获得；认为人对于理论的学习，必须“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认为对于良好道德的固守，要做到如同目对于五色的喜好、耳对于五音的喜好、口对于五味的喜好一样，使所言、所行都不会超出良好道德的规范。

宋明理学家把道德修养的过程理解为一个不断明“理”的过程。程朱学派认为“理”在“物”中，因而主张“格物致知”。按照朱熹的解释，“物”就是“事”，“格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参与的社会实践愈多，所明的社会之“理”也就愈多。陆王学派认为“理”在人的心中，事物中存在的“理”只是人心中之“理”的反映，因而主张“致知格物”。“格物”就是参与社会实践，可见，理学思想家也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

没有道德认知的实践不会产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但仅强调道德认知而忽视道德实践，其道德认知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古人重视道德实践是把握住了道德教育的关键。

古人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教”是中国的一条古训。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也已家喻户晓。

孔子重身教，是实施身教的典范。他与弟子朝夕相处，为弟子所倾心崇拜的不仅仅是他渊博的学识，更有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汉代学者杨雄称教师是“人之模范”（《法言·学行》）；董仲舒则明确提出教师必须“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春秋繁露·玉杯》）要求教师不仅要教授正确的理论，还要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表现。

在家庭教育中，颜之推主张形成良好的家风，他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治家》）“自上而行于下”，是指长辈的身教；“自先而施于后”，是指兄长的身教。

宋代学者王安石有一篇短文，专门探究教育的本源。他把教育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以道强民”，一是“以道扰民”。发布法令诰戒，施教于民之耳目，是“以道强民”；以高尚的道德力量感染民众，实行“浹于民心”的教育，是“以道扰民”。王安石告诫统治者：“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临川先生文集·原教》）孔子认为，

决定社会风气的主导因素是上层人士的道德，他把上层人士通过其行为表现所反映出的道德比喻为“风”，而把民众的道德行为比喻为“草”，他说：风总是在草之上的，风吹向哪边，草就会向哪边倒。“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是孔子的一句名言。“正”就是身教。这四个字道出了行政的本质。

是言教还是身教，是“以道强民”还是“以道扰民”，是当“经师”还是当“人师”是道德教育的重要问题。古人重身教，是把握住了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人重视“学思结合”。学与思的关系实质上是读书与思考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思”。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为现代教育著作所广泛引用。现代人之所以重视孔子的这句话，是因为学与思的关系问题也是现代教育所关注的问题。

孟子称不经过思考的学习为“耳目之学”，由于耳目不会思考，所以往往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他甚至提出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的主张。

汉代学者王充主张通才教育，他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称那些“博闻强识”“览见广博”而不能运用其理以阐述思想观点的人为“匿生书主人（藏书而不读的人）”；批评专事诵读的学习方法是“鹦鹉能言之类也”。（《论衡·超奇》）王充主张独立思考，主张师生之间的“问难”。

宋明理学家主张带着疑问读书。张载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义理》）又说：“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经学理窟·学大原》）他认为“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学理窟·义理》）朱熹主张“熟读精思”。“精思”的过程就是一个“不疑——有疑——不疑”的过程。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

学与思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态度问题。不进行思考，生吞活剥地接受所谓的“知识”，属于“死学”。教育教学中的所谓“启发诱导”，就是要启发学生的心智，诱导学生思考。古人重视“学思结合”，是把握住了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古人重视“因材施教”。作为现代教育重要原则的“因材施教”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孔子是“因材施教”的最早实践者；孟子对“因材施教”的含义作了初步概括；《学记》对“因材施教”的内涵作了提升。

《论语·先进》中关于子路、冉有皆问“闻斯行诸?”而孔子却给以相反回答,并做出了合理解释的记载,被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案列,已为现代教育著作所广泛引用。仔细阅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在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时,都是据其材质而予以指导的。“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了解弟子的材质。孔子不仅熟知弟子的性情、智愚、专长,而且还总结了了解弟子的方式方法。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视其所以”,是考察目的;“观其所由”,是考察方法;“察其所安”,是考察结果。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孔子的“因材施教”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以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深刻理解为依据的。孟子对“因材施教”含义的初步概括是:“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友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学记》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所谓“博喻”,是将教学内容的难易与学生的材质两种因素都考虑在内的教学方法。即是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既要依据学生的不同材质,更要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才能确定。“博喻”提升了“因材施教”的内涵,使其含义更加丰富。

“因材施教”说来易,实行难。如果不了解学生、不明晰教学内容、不能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就不要空喊“因材施教”。古人重视“因材施教”,是对教学真谛的深刻理解,是把握住了一项重要的教学原则。

古人重视“启发教学”。“启发教学”是现代教育著作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词汇之一,然而运用了启发式教学方式,并对什么是启发式教学作了精辟论述的是中国的先哲孔子。

孔子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从不给予现成的答案,他总是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让他们自己去寻求答案。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的意思是“心欲通而未能”;“悱”的意思是“口欲言而未能”,两者都是形容学习者经过积极的思考后仍找不到答案时的情绪状态。知道什么是愤、悱,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启发式教学。”

《学记》把启发式教学进一步概括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思是,善于施教的教师采用诱导的方式教学:引导而不牵强;激励而不强制;告诉方法而不讲答案。《学记》认为,引导而不牵强,就会师生融洽;激励而不强制,会使学生感到轻松;告诉方法而不讲答案,就会引起学生的思考。师生关系融洽、学生感到轻松并能引起学生的思考就是“启发

式教学”。

不仅先秦诸子主张“启发式教学”，宋代开始兴起，在传承学术、培养人才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书院也把“启发诱导”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大部分书院都由名儒主持，学生以自学为主，教师答疑解难，时有师生及同学之间的辩难争论，学术气氛十分浓厚。

中国古代出了那么多思想家、文学巨匠，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得之于世代相传的“启发诱导”的教学方式。古人重视“启发式教学”是把握住了培养创造性思维人才的关键因素。

古人重视“顺导性情”。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着学习效果。如果学生能够体会出学习的乐趣，学习的效果自然会好，反之效果就差。

《吕氏春秋·诬徒》是一篇讨论学生的情感体验对于学习效果影响的专文，该文开篇便说：“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意思是教师的教学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心理需求，使弟子安心、快乐、宽舒、从容、认真、谨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学生负责，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爱，使教学成为师生双方共同参与的活动，做到“师徒同体”。

唐代文豪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是一篇精彩的讨论教育问题的短文。柳宗元用植树必须“顺木之天”的简单道理，阐述了他的“顺天致性”的教育主张。用精彩的文字，在讲述浅显道理的过程中阐释深刻的教育见解，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特点。

王守仁严厉批评束缚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方式，认为那种“若待拘囚”般的教育是导致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说，儿童的性情是“乐嬉游而惮拘检”的，如同刚刚萌生枝芽的草木，“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说，对儿童实施教育，应当“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如同“时雨春风，沾被卉木”一般。（《王阳明全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古人虽然未能从心理的角度对儿童的性情做出科学的分析，但他们重视学习过程中儿童的情感体验，提出应当顺应儿童的天性，并予以适当的引导，这应当说是把握住了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古人重视“循序渐进”。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两位弟子就讨论过怎样实施教育的问题。子游认为，教育应当抓住本质性的内容，不应教授末节的东西。而子夏则认为教育教学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作为教师应当知道哪些内容须早教，哪些内容可晚教。孟子对“循序渐进”有深刻的理解，他讲

述的“揠苗助长”的故事，是对“循序渐进”教学方法的绝好注解。宋明理学家已经将循序渐进运用于教育教学之中。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的“读书法”。他说，就一本书而言，有篇章文句，首尾次第，“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列之患矣”。（《朱子大全·读书之要》）王守仁认为，无论自我的道德修养，还是对他人实施教育都必须循序渐进，他称这种施教方法为“随人分限所及”。他解释说，如同一棵树，当仅有些萌芽的时候只可少浇些水，随着树逐渐长大，浇水的量也随之增多。假如在刚刚萌芽的时候，就把一桶水倾上去，必会把萌芽浸坏了。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教学，王守仁认为应当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决定教学内容的多少，对于能接受二百字的学生，只教授一百字，以使其精神力量常有余地。

无论从教育教学内容的逻辑顺序看，还是从受教者身心的发展规律看，教育都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古人重视“循序渐进”是把握住了教育教学的一条重要原则。

以上九个方面，只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理论的粗略梳理，所反映的也只能是经历了三千多年积淀的中国先哲教育智慧的冰山一角。中国传统的教育教学理论建筑在中国特有文化传统之上，在铸造我们的民族灵魂，培养我们的民族智慧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继承与弘扬。

二

不可否认，传统教育是与中国农业经济相适应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教育的许多根本性问题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教育的许多东西已经过时了。首先，教育目的发生了改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论被改变了；其次，教育内容发生了改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教育”被改变了；再次，教学形式发生了改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个别教学”方式被改变了；最后，随着科学对教育的“渗透”，教学方法、手段也改变了。这许多改变都是为适应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是时代使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比西方迟了几百年，因而在实施教育变革时就不能不比较多地借鉴西方成熟的教育教学理论，这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当我们舶来西方的教育教学模式，并研究西方的教育教学理论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为探讨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的精微而深入钻研西方教育思想发展源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通过这些教育教学模式所反映出来的西方的教育教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传承脉络，是与他们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对逻辑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的文化传统密切联系着的。这就是说，西方现代的教育教学理论是在继承与弘扬了西方古代思想家的教育智慧的基础上，为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有着鲜明的西方文化特征。因此，当我们学习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的时候必须清醒地知道这种学习只能是“借鉴”，而不能是“全盘接受”。认识不到这一点，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就可能难免步“邯郸学步”的后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内涵必然会发生变革，但无论怎样变革，教育的基本要素仍然会存在，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共通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哲的许多语录会经常在现代教育著作中出现的原因。但可悲的是，中国先哲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精辟论述往往是作为论证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的陪衬出现的。当代为数不少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在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也形成了西方的思维模式，连著述文风都西方化了。许多不难解释的教育道理，一定要“提升”到所谓“西方哲学”的高度予以阐述，文辞艰涩，甚难卒读。

要想形成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体系，必须既有继承弘扬也有学习借鉴，两者缺一不可。所谓教育上的“共通性”，不仅指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教育有共通之处，也指中国与外国的教育有共通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继承与弘扬中国先哲的教育智慧以贯通古今；也有必要通过学习与借鉴西方的教育教学理论以融会中西。如果说我们正在培植中国的教育教学理论之树的话，那么，对中国先哲教育智慧的继承与弘扬是要使其“根深”；对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是要使其“叶茂”。

上文述及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教育教学的九大方面，称其为九大原则也好或称其为九大方式方法也好，总之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现代教育教学所必须遵循的。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理论并不是要人们去记诵古代思想家的教育格言，也不是要人们深钻细研古人所阐述的某一教育教学原则从而制定出可供大家共同遵循的教育教学模式，而是要人们循着先哲的思维去理解教育教学的真谛。举例说，所有从教人员都期望自己的教育获得成功，期望施教对象信任自己，并听从自己的诲喻，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一目

的呢?《学记》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学记》的作者用优秀的歌手总能使人自觉不自觉地随着自己的歌声去唱来比喻优秀教师的教学所应当达到的境界。只要细细思考人们为什么会自觉不自觉地随着优秀歌手歌唱的道理,也就会明白导致教学成功的真谛了。

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因人、因事、因时施教,反对设定统一的教学模式,这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孟子提出“教亦多术”,《学记》要人们学会“博喻”,实际上都是在揭示教学方法的本质。教育和教学本来就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为了达到同一个教学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教学风格。善于深入浅出,以娓娓动听的语言,使学生如沐春风的教学方式固然很好;善于逻辑推理,以简约准确的言辞,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不也是很好吗?因此,我们于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理论中所汲取的不是个别言辞,也不是立即可供应用的模式,而是一种教育智慧,是对教育教学真谛的理解。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讨论教育教学问题时,总是用最朴实的语言、用浅显的比喻展开论述的。《学记》是中国两千年前的一部教育学专著,几乎讨论了教育教学的所有问题,其所归纳的教育教学六大原则(预防性原则、及时性原则、循序性原则、观摩性原则、长善救失原则、启发诱导原则)都是现代教育著作中予以重点论述的。如此“皇皇巨著”,竟然只有一千多字。其文字之浅易,蕴涵之丰富又是当代的教育著作所无法相比的。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为什么不去读一读呢?中国先哲的教育教学著作都不难读懂,《学记》、《劝学》、《师说》、《原教》等,都颇具韵味,可琅琅上口。在诵读这些教育教学精篇,品味中国古典文化意蕴的同时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先哲教育智慧的熏陶,这是一件很令人快乐的事情。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贯通古今以植其根,融会中外以繁其叶”,这是繁荣与发展我国教育所应遵循的途径。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编委会

主任委员：王 敏

副主任委员：张全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李天军 李新泰 张 华 蒿 峰

目 录

论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理论的继承与弘扬

(代前言)	1
一、孔子	1
二、墨子	56
三、孟子	76
四、荀子	111
五、《管子·弟子职》	138
六、《礼记·大学》	143
七、《礼记·中庸》(节选)	155
八、《礼记·学记》	169
九、《吕氏春秋》(选读)	181
十、董仲舒	188
十一、《新书·保傅》	199
十二、《史记·论六家要指》	206
十三、杨雄	212
十四、王充	221
十五、颜之推	229
十六、韩愈	244
十七、柳宗元	256
十八、王安石	263
十九、张载	272
二十、程颢、程颐	280
二十一、朱熹	288
二十二、张栻	306

二十三、陆九渊·····	312
二十四、叶适·····	318
二十五、吴澄·····	324
二十六、王守仁·····	326
二十七、黄宗羲·····	352
二十八、王夫之·····	357
二十九、颜元·····	362
跋·····	370

孔 子

孔子（前 551 ~ 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今山东、曲阜市）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幼年丧父，受母亲教诲颇多，虽“贫且贱”，却志存高远。15 岁时“志于学”，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曾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表示要向所有有知识的人学习；“入太庙，每事问”，立志问清所有不懂之事；为研究几近失传的《韶》乐（传说为大舜时期的音乐），曾“三月不知肉味”；为探《易》之精奥，也曾“韦编三绝”。正是靠了这种学、问功夫，孔子成了当时最博学的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术，立志建立新型的社会道德规范。五十多岁时，以大司寇“摄行相事”，主政鲁国，使鲁国呈现了“鬻羔豚者弗饰贾”（公平交易）和“途不拾遗”的社会风气。后来，又为宣传、推行他的理论而周游列国，曾游说七十余位国君，终不能为所用。晚年，孔子返回鲁国，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及教育教学活动，在保存、传承三代的文化典籍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由于周天子统治力的削弱，固有的文化教育格局被打破，出现了礼崩乐坏、官学没落、文化下移、学术扩散的局面。这一现象反映在典籍上，就是所谓“竹帛下庶人”。孔子形象地称这一现象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贵族集团独享文化教育的结束及学术在民间流传本应是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官学的没落，使文化失去了传承的主渠道，数百年的文化积淀处在渐传渐失的危险之中。孔子大约在 30 岁时开始招收弟子，举办私学，另辟传承文化和发展学术的蹊径。

私学与官学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机构。官学是政府出资设立的，教育目的